

引文格式: 卢少锋, 朱雨薇. 捕与诉: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检察机制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 (1): 31-38.

# 捕与诉: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检察机制

卢少锋, 朱雨薇

**摘要:** “捕诉合一”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改革试点以来就备受争议, 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本来分开执行, 就是为了形成相互之间的制约, 但是在中国的司法背景下未必就是合适的。从探索“捕诉合一”提出的原因开始探析, 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审检”模式、“检警”模式上的不同, 然后从反面来论证我国的法院还不适合拥有审查逮捕权, 以及作为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的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部门之间的关系。接着, 分析在“捕诉合一”模式下可能产生的问题, 问题既有法学理论上的, 也有司法实践过程中的。有的问题, 或许现在还不能很好地解答,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法律发展, 时间会给出更好的答案。最后, 就审查逮捕问题的“司法化”进行了分析, 肯定了“司法化”的必要性, 并希望通过后续程序中审查羁押程序的救济, 来进一步解决审查逮捕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关键词:** “捕诉合一”; 检察机关; 司法化

**作者简介:** 卢少锋, 法学博士,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朱雨薇, 郑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926.3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0.01.004

##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捕诉合一”模式改革试点以来, 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有关的话题成为法学界争议热点。特别是监察法的通过, 检察院面临职权的变动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定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此为节点进行更高热情的改革探索。近来, 关于“捕诉合一”和“捕诉分离”两种模式的争议更加激烈。比如, 陈瑞华并不赞成“捕诉合一”, 认为“捕诉合一”违背诉讼基本规律, 削弱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 实践中也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辩护的实现<sup>[1]</sup>。张建伟则认为, “捕诉合一”和“捕诉分离”没有对错之分, 只要对逮捕条件严格把关, 实践操作未必会有那么多的滥用行为。再者, 居高不下的羁押率也和“捕诉合一”模式或者“捕诉分离”模式没有必然的关系。况且, “捕诉合一”对于提高司法效率, 缓解当下司法实践中的压力确实有帮助。“捕诉合一”是将检察机关内部的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合为一体, 由同一个检察官或者同一个检查组成员行使该权利; 也就是说, 在形式上, 好似审查逮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简化成一个程序, 都由一个检察官来具体办理。在此过程中难免有失偏颇, 这是争议最大的地

方。其实,这其中的问题是,“捕诉合一”真的意味着两个程序的合一吗?实质上并不是,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仍然是各自独立的阶段,只不过在实践操作中,这两个流程的衔接更加紧密。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时,检察官是否都做到了行为符合法定条件,并且真正履行了检察官应承担客观真实义务的职责<sup>[2]</sup>。

我国检察机关内部这两个部门时分时合,1953年,检察机关内部并没有把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两个程序分开。到1996年,由于检察官权力过大,权力滥用严重,于是把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分为两个部门,相互牵制。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重新提出要将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合二为一。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部门的分分合合,看似一个历史的循环往复,实则不然。历史条件的发展,总是会催生新的法制要求。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再次合为一体,也存在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但是很显然,如今的法治不只是以这一个矛盾为重点了。当今法治,更加注重的是人权保障和公平正义,制约权力的滥用只是作为一个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对于“捕诉合一”模式的评判不能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应当挖掘背后更加深层次的原因,立足于中国法治实践的根本,从新的角度看待“捕诉合一”。

## 二、“捕诉合一”模式的原因探析

不论是在“捕诉合一”模式下还是在“捕诉分离”模式下,中国的审查逮捕权都是由检察机关行使的。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机构都是设立在检察机关内部,所以“捕诉合一”模式也可以说是检察机关内部机构整合的结果。对比英美国家典型的“令状主义”,由法官签发逮捕令,我国审查逮捕具有明显的特点<sup>[3]</sup>。针对现推行的“捕诉合一”模式进行原因分析,首先从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入手,然后从法院角度论述我国在当前法治状况下法院不适合行使逮捕权做进一步分析,最后从检察院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部门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可实行“捕诉合一”模式。

### (一) 中国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

检察机关的设立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审检分立制”,以美国、英国为典型代表;一种是“审检合署制”,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为代表<sup>[4]</sup>。采用“审检分立制”的国家,一般将检察机关定性为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拥有行政权,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和警察是协作关系。这就是说,在英美法系中,检察官和警察共同协作完成对犯罪的追诉,检察官不直接指挥警官。同时,警察是侦查的主体,具有广泛的调查权,很少受到其他机构的干涉,检察官一般无权干预警察的具体侦查活动。这就意味着,警察的权力很大,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况且英美法系又是典型的当事人主义,视检察官为当事人。所以,在这一背景下,英美法系中法官牢牢掌握了侦查过程中关于人身和财产的批捕权。采用“审检合署制”的国家将检察机关定性为司法机关,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在刑事职权方面拥有较多的权力。比如:在法国,检察官被称为“站着的审判官”。在检察官和警察的关系中,检察官居主导地位。在日本,检察官基于侦查的权限,对警察进行指挥、指导,确保侦查正确进行,同时还要对收集的证据进行法律分析和评价。日本刑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检察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对犯罪进行侦查。检察官有权提出对司法警察的惩戒、追诉,但是日本实行“令状主义”,所以法官会对检察官的这种权利进行监督<sup>[5]</sup>。由此可以看出,“审检合署制”模式下,检察机关的权力较大。为了形成有效制约,检察机关在限制或暂时剥夺犯罪嫌

疑人人身自由方面,受到法院的限制。比如在法国,检察官没有批准逮捕权和先行拘留权,逮捕或拘留嫌疑人需要向预审法官申请。比如在德国,检察机关既拥有自行侦查的权利,又有侦查指挥权。但是检察官也没有羁押权<sup>[6]</sup>。总而言之,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掌握批准逮捕或者羁押权力的都是法官。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检察机关则是在宪法中被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它既有行政权的性质,也有司法权。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检察机关不拥有不存在德国、法国检察机关的领导地位,需要受到法院制约;公安机关也不拥有英美法系中警察不受干涉的侦查权,并由法官进行严格把控。在我国政治体制下,显然不存在这种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之间的绝对对抗。所以,在我国的司法状况下,检察机关拥有审查批捕权,可以更好地行使监督职责。虽然司法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监察法的出台,让检察机关不再拥有针对行政官员的侦查权,但是这只意味着检察机关职能由以前的“专门化”监督转变为“检察监督”,更着重于监督国家法律的统一实行和突出表明其是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代表者<sup>[7]</sup>。然而,这种检察机关的全新定位,并不影响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的监督地位,只是监督的形式以及方式有所变换。所以,我国检察机关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其成为审查批捕主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 (二) 法院不适宜行使审查逮捕权力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虽然很多学者呼吁将批捕权移交法院,但是我国法院系统未必适合掌握这一权力。一方面,最高检察院曾经提出将审查批捕的权力部分转移,但是最高法院并不愿意接受。其一,当下法院本来就面临“案多人少”的司法窘况,司法资源匮乏。其二,司法改革,确定法官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也就是意味着法官的责任更大了。如果由法官批准逮捕,那么不仅意味着法院提前介入侦查,严格的责任追究制,以及错案赔偿等规则,将使法官更难真正地保持独立。另一方面,我国社会是典型的科层型权力组织,不但行政权力过大,而且上下级之间是严格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sup>[8]</sup>。即使法院上下级之间是指导和被指导关系,等级关系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在案件的实际判决中,往往上级的意见会成为决定性意见。法院并没有自上而下自成体系的系统,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还要受到地方政府的牵制,可见我国行政权力对司法还是有重要的影响的。特别是监察委,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强有力监察,当然也包括对法官进行监察。那么,面对监察委侦查的案件,法官或多或少也会面临压力,对正在强力进行的法院体系改革,法官实质中心审判权,也可能是一个打击。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过早地介入案件,那么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一错到底的“铁案”,法官的中立性也会更加难以维系。所以,在我国目前司法局面下,法官并不适合掌握批捕权。

从我国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来看,因为具有监督的职责,所以在审查批捕的时候,检察机关是作为中立的监督者来监督侦查人员的行为,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预审法官”。只不过,检察人员在行使此种权力时,更多的是以书面审查的方式,单方面做出判断,行政性意味浓厚。但在当前“捕诉合一”试点改革中,审查逮捕的方式正在逐步改变,不再是单单依靠侦查人员递交的书面材料单方面做出判断。这实际上也推动了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

## (三) 内部机构之间的制约

审查批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一直都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两者分离是为了形成制约,防止批捕权力的滥用。所以,“捕诉合一”遭到诟病的一点就是丧失了这种相互监督和制约。但是这

种内部机构之间制约监督,成效其实并不大。正如龙宗智所言,我国的公检法三家机关“同质化”程度很高,三家机关更是经常在政法委的主持下“联合办案”。“联合办案”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三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浩浩荡荡的司法改革才一波又一波开展。同理可言,仅仅依靠内部机构之间的制约更是“不可靠的”。何况,审查批捕的部门和审查起诉的部门有可能是同一个检察长分管。再则,如果审查逮捕的检察官批准逮捕,那么审查起诉的检察官在案件事实可起诉可不起诉的情况下,也会碍于同事之间的情面,进行起诉<sup>[9]</sup>。此外,由于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分离,在实践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的情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浪费了司法资源。最重要的是,由于职权存在交叉,就我国羁押是逮捕的自然延伸状态而言,会造成羁押期偏长。一直以来,我国法学界都存在“谁来监督监督者”的疑问。从哲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果为了监督一个机构而设立一个监督机构,为了监督这个监督机构,而接着设立一个监督监督机构的机构,这样无限循环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也是对特定的法律人员的不信任,不利于在公民心中彰显法律的价值。其实法律的价值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它并不真实存在,但是人类需要这样合适的虚幻来进行规制和统治<sup>[10]</sup>。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假设,相信法官是超然中立的,他是为维护人类的公平正义而存在的;相信检察官是客观的,他是国家法律维护者。否则,英美法系中“自由心证主义”就没有存在的根基。自由心证主义相信,法官的判决是源于内心的公正,秉持公平正义。正是因为民众这样相信,所以法官在英美国家被民众所相信,民众也愿意执行法官的判决。就“捕诉合一”而言,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的合并正是适应了现下法治的需要,逐步整合精简机构。在程序上,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之间的阶段衔接应该调整出新的方式,比如对救济方式的完善,一些改革试点中推行的听证方式,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监督”;让权利相关人真正参与听证,也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sup>[11]</sup>。

### 三、“捕诉合一”模式问题分析

#### (一)“捕诉合一”模式是否混淆了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的性质

沈海平认为审查逮捕权是一种司法审查权,检察机关作为一个中立者来审查侦查人员是否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sup>[12]</sup>。而公诉权是一种行政性质的权力,是专门机关的人单方面做出应不应该起诉的决定。张建伟则认为,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都具有司法审查性,检察人员在这个程序中负有真实客观的义务,都类似于法官的作用,属于广义司法权的范畴。洪浩的观点又不同于他们,洪浩认为,我国检察机关的权力是一种混合权力,它具有很浓厚的中国本土气息,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集合体,应该以检察机关所兼具的混合属性为基础,来分析“捕诉合一”模式<sup>[13]</sup>。即便是明确区分了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的不同属性,但是沈海平也承认,在中国当下的法治情况下,“捕诉合一”的模式利大于弊。对于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的划分,不论哪一种学术观点,都是基于检察院的内部机构设置。正如邓思清所言,我国的政体不具备三权分立的基础,也不适用西方的以司法权审查行政权的司法模式。通过前文对国内外“审检”模式、“检警”模式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我国的检察机关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检察机关,法律文化的发展必然根植于其本土文化。所以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有不同的权力性质来质疑“捕诉合一”模



式,显然并不是很恰当。

## (二)“捕诉合一”模式是否削弱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捕诉合一”模式是检察人员的“合一”,由同一个检察人员行使审查逮捕权和审查起诉权,并不是审查逮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合为一个程序。所以,“捕诉合一”模式并没有取消审查逮捕这个程序。那么,由同一个检察人员全程关注逮捕问题和起诉问题,是不是就会减弱本来“捕诉分离”模式下的监督强度呢?事实上并不一定会减弱;相反,还可能会增强监督的强度。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分离的模式下,虽然这两个部门都会审查案件,但是各自对案件信息的了解是相对片面化的,而且在职能交叉的情形下还有可能推诿责任,导致监督不力。但是,如果是同一个检察人员做出的逮捕决定与起诉决定,那么,该检察人员在做出逮捕决定时会更加详细地了解案情、收集材料,会全方位调查了解该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被逮捕,为了后续起诉程序的顺畅,检察人员会更倾向于采用严格的逮捕条件和标准,这又会反过来引导侦查更加准确、精细。这样来说,“捕诉合一”不仅没有削弱检察机关监督的职能,反而强化了对侦查的引导,提高了对案件质量的要求。

## (三)“捕诉合一”模式是否扰乱了证明标准

逮捕是一种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且具有社会危险性就可以逮捕;但是我国的起诉标准和法院的审判标准是一样的,即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很明显,起诉的证明标准要高于逮捕的标准。那么,如果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都由同一个检察人员承担,就有可能导致检察人员根据自己掌握证据的情况随意拔高或者降低审查标准。比如检察人员把案件都按照起诉的标准去审查,或者都按照逮捕的标准去审查。我国遵循的是法定起诉主义,具体不起诉的情形,都由法律明确规定,除了八种法定不起诉情形,斟酌不起诉和附条件的不起诉,其适用范围都有明确的限定。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只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起诉标准不会有偏差。相对应的,逮捕的标准比较低,检察人员可能会为了后续起诉的顺利,再加上虑及现行改革下追究检察人员的错案责任制度,所以,检察人员可能会倾向于提高逮捕的标准,这实际上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毕竟在我国羁押是逮捕的自然延伸,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其实在“捕诉合一”模式下,检察人员的提前介入和引导侦查,更有利于审查逮捕是否符合条件。在逮捕的条件中,有一款是具有社会危险性。一般来说侦查人员不会就该条件进行相关的证明,检察人员也仅仅是依靠书面材料进行判断。“社会危险性”的斟酌也是导致“可逮捕可不逮捕”的情况下实行逮捕的原因之一。但是在“捕拆合一”的情况下,检察人员对法定条件的把控会更加严格,而不是得过且过,毕竟“谁逮捕谁起诉”。逮捕和起诉的证明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是同一个检察官,做到完全的“知而不用”是比较困难的,好像在强行撕裂一个人的思维一样。但是,只要检察人员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进行,以实现公平正义为基石,相信这个问题在往后的司法实践中会有更加适当的解决方式。

## (四)“捕诉合一”模式是否会不利于辩护权实现

在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阶段被律师称为“黄金辩护时期”。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决定不予逮捕的无罪案件占刑事案件的绝大多数;一旦决定逮捕,面临起诉的可能性就会很高。基于我国检察机关的业绩考核方式,一旦检察机关起诉,法院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做有罪判决。那么,“捕诉合一”模式下,是不是就减少了辩护人的辩护机会以及说服检察人员的可能性?首先,审

查起诉和审查逮捕虽然由同一个检察人员决定,但是它们仍旧是独立的诉讼阶段,犯罪嫌疑人拥有的辩护次数还是一样的。其次,正因为是同一个检察人员审查逮捕和起诉,所以他对案件会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把控。同时,检察人员基于后续起诉的考虑以及检察人员责任到个人的考虑,会更加慎重地对待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做出不予逮捕的可能性也会更大。此外,“捕诉合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捕诉分离”模式下由于诉讼阶段的改变,而使律师找不到检察人员的情况,反而有利于辩护权的实现。叶青就《上海规程》说道,审查批捕按照诉讼化的办案要求,听取各方意见,复核关键证据,并且对侦查人员提请批捕意见进行全面、逐一审查,此外承办检察人员出庭,也更符合司法的亲历性要求,这些都可以很好地回应“捕诉合一”模式下产生的对辩护权维护的疑虑<sup>[14]</sup>。

## 四、“捕诉合一”未来趋势

### (一) 程序法上的发展趋势

根据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人员在审查逮捕时,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但是具体的询问方式没有规定。对此,学界多数认为以听证会的方式比较合适,这也是审查逮捕司法化的第一步。听证会由检察院主持,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以及侦查人员的意见,然后由检察机关人员居中裁判,决定要不要逮捕。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侦查主义”占据主流,检察人员审查逮捕是依据侦查人员单方面提供的书面材料做出判断,也没有给予犯罪嫌疑人一方辩护的机会,不利于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所以,关于审查逮捕的“司法化”呼声越来越高。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审查逮捕“司法化”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张建伟认为对于争议比较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举行审查逮捕听证会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司法的公信力,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案件实则是没有必要的<sup>[15]</sup>。因为即便是在大多数由法官掌握逮捕权的国家,法官对逮捕的审查也没有那么严格,警察申请司法令状,法官通常都会批准,此时法官相当于警察的“橡皮图章”。例如美国刑事诉讼法中“令状原则”可以预防无实质理由的强制处分,但是令状的申请单方面、极为快速,警察部门也可以使用“相当理由”的判断,因而未必达到预防效果<sup>[16]</sup>。所以他们的审查方式未必优于我国检察机关的审查方式。

考虑到我国司法资源有限,想要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全境短时间内推行审查逮捕以听证会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种“司法化”的发展趋势却是很有必要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以追求真实主义为价值目标,由于长期以来“侦查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要求对犯罪案件一查到底,因此有罪推定还存在于我国司法实践的各个角落。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虽然全面铺开,但是遇到的阻力也很大。况且,我国一直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法官不是消极被动,而是积极主动。结合我国的法治发展历程,这种情况一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但是它也导致政府以“大家长”的姿态对待公民。延伸到司法领域,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们自身的行为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权威的,而被认定为犯罪的人必须真实完整地回答问题<sup>[17]</sup>。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坦诚交代,或者保持沉默,就会被认为是“认罪态度”不好。那么,检察人员在提请法院量刑时就会把这种认罪态度也考虑在内。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无法真正落地生根的原因,因为作为保障制度的“沉默权”无法建立,且在我国

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交代的义务。所以,考虑到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作为我国特有的情形——羁押是逮捕的自然延伸,在我国行政权力强大的背景下,审查逮捕的“司法化”还是很有意义的。

审查逮捕的“司法化”进程可以逐步推进。一些省市试点开展“诉讼式审查机制”的方案各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以案件的是否重大复杂、是否具有争议性、是否涉及隐私等为标准来决定公开听证或者不公开听证。对于听证的具体程序以及邀请的人员也各不相同,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比如邀请人大代表、政府官员是否合适?如果是“司法化”的审查会,就应该采用双方平等对抗,检察人员居中裁判的基本模式,那么政府官员的到场所起的作用还要在实践中逐步发现。此外,是否应当听证、是否应当公开听证的标准还要进一步明确,其标准应当以利于审查逮捕“司法化”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适用为方向。

### (二) 后续状态未决羁押救济的完善

我国的羁押是依附于逮捕的,是作为逮捕的自然状态存在的,这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以对待审查逮捕,我国司法机关更要慎之又慎,我国长期存在未决羁押率居高不下、羁押期限过长的现象。因此,不仅要在审查逮捕那一阶段严格把关,也要在逮捕后,对于未决羁押的救济做好工作。首先,在审查逮捕后,如果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应当有不服该决定的权利,例如可以进行申诉,可以要求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其次,如果对于羁押审查能够更加严格,不但利于保障人权,也是对审查逮捕在后续程序上的救济。对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目前我国法律规定检察院具有一般建议权,即是检察院认为不应该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不应该羁押的建议,但是这种建议权只是一种一般性建议,适用范围也有所限定。因此可以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比如将建议权改为决定权,增强刑事执检部门权力的刚性,然后将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也可以适当借鉴德国的引入司法审查、定期自动审查等程序。

### (三) 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认罪认罚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检察院对案件的把控力度进一步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积极认罪认罚,检察院依据法律规定起诉或者不起诉,并在起诉时提出适合的量刑建议。2019年10月通过的《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检察院可以提出确定刑的量刑意见,并且审查侦查认罪认罚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性、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则更需要检察院比较深入地了解案件,而不仅仅是查看侦查机关送来的文件资料。“捕诉合一”模式更有利于检察院掌握案件动态。因为逮捕就是负责该案件的检察人员批准的,该检察人员必定是对案件情况有了实质性了解,才会批准逮捕,那么后续程序上,不论是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选择认罪认罚制度,还是审查认罪嫌疑人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都能更好推进。因为该检察人员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全面且深刻,对证据的掌控也比较清晰,所以更有利于认罪认罚制度的推行,消除社会矛盾,提高司法效率。

#### 参考文献:

- [1] 陈瑞华. 异哉, 所谓“捕诉合一”者 [EB/OL]. (2018-05-30) [2019-03-20]. <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DJ2SMUDR0530W1MT.html>.
- [2] 龙宗智. 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容及展开 [J]. 人民检察, 2016 (Z1): 48-51.
- [3] 宋英辉, 吴宏耀. 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39-42.

- [4] 甄贞. 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557-570.
- [5] 徐尉. 日本检察制度概述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56-65.
- [6] 宗玉琨.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53-58.
- [7] 陈瑞华. 论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 [J]. 政法论坛, 2018, 36 (1): 3-17.
- [8] 米尔伊安·达玛什卡. 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 [M]. 郑戈,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24-30.
- [9] 步洋洋. 除魅与重构: “捕诉合一”的辩证思考 [J]. 东方法学, 2018 (6): 132-140.
- [10]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 [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 [11] 陈瑞华. 程序正义理论 [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141-146.
- [12] 沈海平. 捕诉关系的辩证思考 [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8, 26 (4): 51-63.
- [13] 洪浩. 我国“捕诉合一”模式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 (4): 28-42.
- [14] 叶青. 关于“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理论反思与实践价值 [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 (4): 3-11.
- [15] 张建伟. “捕诉合一”的改革是一项危险的抉择? ——检察机关“捕诉合一”之利弊分析 [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8 (4): 12-27.
- [16] 王兆鹏. 美国刑事诉讼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63-68.
- [17] 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 [M]. 5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811-815.

## The Procuratorial Mechanism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ivision, Tend to Unit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Unity, Tend to Divide”

Lu Shaofeng, Zhu Yuwei

**Abstract:** The “unity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since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proposed the experimental reform. The arrest examin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prosecution have been implemented separately for mutual restriction, but it may not be appropriate in China’s judici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asons for the “unity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modes of “examination” and “procuratorate and police”, then demonstrates from the opposite side that Chinese courts are not yet suitable to have the right to examine arrest,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rest examination department and examination of prosecution department inside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Then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under the mode of “unity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 both in legal theory and in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practice. Some problems may not be well solved yet, 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the law, time will give a better answer.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judicial tendency” of arrest examination, affirms the necessity of “judicial tendency”, and hopes to further resolve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arrest examination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relief of detention procedures in the follow-up procedure.

**Keywords:** unity of arrest and prosecution; procuratorial organ; judicial tendency

(收稿日期: 2018-12-05; 责任编辑: 晏小敏)